

從「唐詩典律史」的詮釋視域看 「孟浩然詩」在唐代詩學上的意義 ——現今「唐詩史」撰寫、研究之 「方法論」的省思

侯雅文

政治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提 要

本文所謂「唐代」乃涵括唐五代時期。所謂「唐代詩學」在此指包括唐五代詩選本、詩話、筆記、詩作、文集等凡涉及「孟浩然詩」評論介述的記載，皆屬於研究的範圍。在詮釋的進路上，乃是由「唐詩典律史」的視域，去論述唐五代時期的詩人、詩學家對「孟浩然詩」的接受結果。

就內容而言，可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由省思現今「文學史」、「唐詩史」對「孟浩然詩」詮釋、評價的結果，提出「孟浩然詩典律史」的系列性論題。這項論題在於考察歷代文士對「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並從中分析、歸納促使「孟浩然詩」典律化的因素及條件。這項研究成果，可以提供現今「唐詩史」的撰寫、研究，對顯自身特點的參照知識。就「方法論」的觀點而言，這項研究具有必要性。

第二部分針對上述系列性論題的第一階段論題：「孟浩然詩」在「唐代詩學」上的意義，進行論述。這項成果可以做為對照宋元明清文士詮評「孟浩然詩」之意義與特色的參照知識。在此一研究取向，本文先建構「唐代詩學」所呈現「孟浩然詩」的「範作」及「準典律基模」，其次從「詩觀」及「文化傳統」說明「唐代詩學」對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最後則從「社會或文化關係」、「聲望資產」、「傳播推廣」等面向，詮釋「孟浩然詩」在唐代準典律化的社會條件。

關鍵詞：孟浩然 典律 接受視域 唐詩 方法論

從「唐詩典律史」的詮釋視域看 「孟浩然詩」在唐代詩學上的意義 ——現今「唐詩史」撰寫、研究之 「方法論」的省思

侯雅文

政治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一、現今「唐詩史」撰寫、研究之「方法論」的省思： 以「孟浩然詩典律史」為例

本文對「典律」的界說是：具有「權威性」而足為模範之「特定作品」；另將具有權威性而足為模範之「特定作家及其總體作品風格」，稱為「典範」。上述所謂的「權威性」不是來自於作品本身所涵具之絕對而普遍的價值；而是來自於作品被「同一」與「不同」時期秉持相近或不同意識型態之閱讀群體的共同認可。因此，本文對「典律」的觀點，偏向作品被歷代讀者接受的過程。然而，「典律」的完成，必須累積許多時代的閱讀經驗；倘若某些作品只在「同一」時期，受到相近或不同意識型態之閱讀群體的共同認可，則未必可稱為「典律」，本文另以「準典律」稱之。又倘若某些作品，在某一時期，受到某一特定意識型態之讀者的認可，但尚未能達到「準典

律」的程度，則本文以「範作」稱之。^❶

現今，當我們欲去書寫「唐詩史」，或是欲去研究某一文論家所建構之「唐詩史」，在「方法」上，必須先就既有「唐詩典律」，考察其所以被「典律化」的過程，以做為「參照性知識」，用來對顯我們所建構之「唐詩史」的特色以及所欲傳達的「詩觀」；或是用來對顯我們所研究的文論家，其所建構之「唐詩史」的特色及其所欲傳達的「詩觀」。蓋因「唐詩史」的建構，必然得通過選擇、編排、詮釋眾多特定唐代詩人詩作而後成事；其結果，亦必「回應」該特定作品在歷代的閱讀經驗中，被接受的狀況。所謂的「回應」可以包涵下列三種情況：(一)順承既有「唐詩典律」及其被賦予的詮釋觀點；(二)提出新的「唐詩準典律」；(三)改造「既有唐詩典律」被賦予的詮釋觀點。從這個角度而言，「唐詩史」的建構，不以追求客觀知識為終極目的；在做法上，也往往不是去重複前人描述唐代有那些典範詩人的成果而已。更重要的是，透過對這些典範詩人之特定作品的選擇或詮釋，去凸顯順承或改造既有文學史觀的意圖。上述所謂「參照性知識」，即指本文所欲建構之「唐詩典律史」。就此一「典律化」的過程而言，固然必經數代而後成，然自唐代，即開其端。此一開端，可視為「唐詩準典律」建立的階段。

本文乃是在上述觀點及操作方法的預設下，省思現今「詩史」、「唐詩史」的論著對「孟浩然詩」建構的結果；從而導出「孟浩然詩典律史」的研究計畫，而以「孟浩然詩」在「唐代詩學」中被接受的狀況及其特定作品「準典律化」的情形，做為第一階段的論題。此一研究的效用，一方面可以「孟浩然詩典律史」，做為建構「唐詩典律史」的範例；另一方面則用此一研究成果，做為詮釋宋元明清文士評論、編選、評點「孟浩然詩」的參照性知識。以下則就現今「詩史」、「唐詩史」如何建構「孟浩然詩」，並舉明代李夢陽參評《孟浩然詩集》的內容為例，略加陳述，以申明此一論題的必要性。

❶ 本文對「典律」、「準典律」、「範作」、「典範」的界說，乃參考侯雅文：〈宋代「詞選本」在「詞典律史」建構上的意義——對「詞史」的研究與書寫提出「方法學」的省思〉，《淡江中文學報》第18期，2008年6月，頁117-120而來。

現今「詩史」、「唐詩史」對「孟浩然詩」建構的結果，其中共識程度較高的詩作，如〈過故人莊〉、〈宿建德江〉、〈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歲暮歸南山〉等等。其中，諸位學者所以引述〈歲暮歸南山〉一詩，主要用來說明孟浩然功名不遂的際遇；而未必以之作為孟浩然詩風的代表。當代學者對上述作品的詮釋觀點，大多集中在作品題材以「山水」、「田園」為主；內容情意則以「友朋情誼」、「羈旅客愁」為主，略及「功名仕進之情」；表現手法以「語言自然清新」、「寫景雕琢刻劃」為主。不過，由於各人觀點互有歧異，因此有時對同一作品所進行的詮釋結果便不同。如〈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一詩，葉慶炳、李曰剛、阮忠諸位先生皆從「求仕」的角度去詮釋之，其中若干先生甚至由此批判孟浩然的人格未能完全免俗。^②不過，張建業先生卻僅就「善於寫景」之有關「興象」的角度去詮釋之，似乎有意簡化孟浩然「仕」、「隱」駁雜的人格。^③另外，若就諸位學者共識程度較低的詩作而言，如〈留別王維〉、〈洗然弟竹亭〉、〈送陳七赴西軍〉等等而言，其中〈留別王維〉那類抒發「懷才不遇」之悲感的詩作，尚能獲得若干學者的關注。至於像〈洗然弟竹亭〉、〈送陳七赴西軍〉那類直陳「建功立業」之壯志的詩，只有極少數學者如阮忠先生將之列為孟詩的代表。^④這類作品皆關乎「追求功名」，可寬泛地與上述〈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劃歸同一類。然而，諸位學者多選孟詩那類描寫山水、田園而抒發閑適之情或羈旅客愁的作品；而少選表露「追求功名」之心或「功名失意」的詩作，顯示這類作品受到忽視。^⑤這當

② 阮忠詮釋〈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一詩的本意「在於求官」而不是「純粹的山水詩」，但沒有明確批判孟浩然的人格。見氏著：《唐宋詩風流別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7年），頁84。葉慶炳據此詩，評斷孟浩然「心境之塵俗雜亂」。見氏著：《中國文學史》（台北：學生書局，1990年），頁357。李曰剛據此詩，評斷孟浩然「其內心之苦悶而未能擺脫塵俗」。見氏著：《中國詩歌流變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頁323。

③ 張建業：《中國詩歌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頁109。

④ 阮忠：《唐宋詩風流別史》，版本同註②，頁83。

⑤ 如張建業先生概括孟浩然的詩，「主要是描寫山水田園景色」，見氏著：《中國詩歌史》，版本同註③，頁108。游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主編：《中國文學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0年），頁419，提出如下論斷：「孟浩然的代表作品是山水田園詩」。鄭賓于：《中國文學流變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332-336，所錄孟詩以「沖淡溫雅」、「超然之致」為主，並由此印證「浩然對於功名的心甚是淡薄」。

中實隱涵如下的問題：何以現今「詩史」、「唐詩史」對「孟浩然詩」的建構，偏重「山水」、「田園」的題材與「閒適之情」的面向？除了因為「孟浩然詩」中，這類作品所佔比例較高之外，是否也接受了某些特定的「孟浩然詩」詮釋傳統？至於個別學者凸顯「孟浩然詩」中相對受到其他多數學者所忽視的作品，此舉便可能涵有改變該特定詮釋傳統的意義。

又諸位學者雖共推孟浩然抒寫「山水」、「田園」之作，然而因為對孟浩然與陶淵明、謝靈運之承變關係的認定不一，使得他們對這些代表作的詮釋觀點也出現歧異。如李曰剛先生偏就「表現手法」詮釋〈宿建德江〉、〈過故人莊〉，而欲凸顯孟浩然「山水詩之作風近於大謝」。他自述此一觀點乃是承杜甫〈遣興〉詩所謂「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而來。^⑥又如陸侃如、馮沅君、木齋諸位先生則偏就「人格」、「行事」去詮釋〈宿建德江〉、〈過故人莊〉，而欲凸顯孟浩然詩「情景交融」、「凸出主體」可上契陶淵明。他們自述此一觀點主要承自唐代王士源對孟浩然之「性情」、「行事」的敘述而來。^⑦又如葉慶炳先生以為孟浩然詩「兼有陶、謝兩家風格」，他舉〈過故人莊〉做為孟詩上承陶詩之證，而以〈彭蠡湖中望廬山〉一詩為孟詩上承謝詩之證。^⑧然而其中〈彭蠡湖中望廬山〉卻未被各家所共同認定堪為孟詩之代表作。就〈過故人莊〉一詩而言，主要描寫田園農事的生活，與陶淵明的詩風有相近之處，故足可作為孟詩上承陶淵明之範例。至於〈彭蠡湖中望廬山〉一詩先以較多的篇幅「寫景」，而後再陳述「隱逸」的志向，這二部分各成段落，並未相互交融而不可分割，與謝靈運詩的表現手法有相近之處，故足可作為孟詩上承謝靈運之範例。反觀前述李曰剛先生亦曾取〈彭蠡湖中望廬山〉為證，說明孟、

⑥ 李曰剛：《中國詩歌流變史》，版本同註②，頁323。

⑦ 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62，據唐·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論定孟浩然「與陶潛、王維是很相近的」，並引〈宿建德江〉為例。木齋：《中國古代詩歌流變》（北京：京華出版社，1998年），頁249-250，則依據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新唐書·孟浩然傳》，論定孟浩然「成了陶潛第二，其詩作也多是沖淡清曠，自然灑脫」，並引〈過故人莊〉、〈宿建德江〉為例證。

⑧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版本同註②，頁358。

謝之關聯，但他何必還要選取〈過故人莊〉一詩中「寫景寫實」之句，以便將這類作品上附謝靈運之詩風呢？這其中難道沒有扭轉孟詩中像〈過故人莊〉這類作品與陶淵明的關係，從而賦予它新的典律意義之用心嗎？此外，孟詩中的確有若干像〈彭蠡湖中望廬山〉之類的作品，可是由於學者們只欲凸顯孟詩上承陶詩之關係，因而對這類作品也就少予關注，這當中都隱涵了學者基於特定的詩觀，或繼承特定的詩學傳統，而塑造孟詩典律之用心。又從上述所論，可見諸位學者們對孟詩典律的建構，已有回應唐代詩學之處。

多位學者所選的孟詩，大多以「五言」為主，甚至完全不錄「七言」之作。只有少數學者兼及孟詩中「七言」之作，如陸侃如、馮沅君、阮忠諸位先生，皆共推〈夜歸鹿門歌〉一詩。^⑨何以如此？除了因為孟詩中，「五言」所佔比例偏高之外，是否也接受了某些特定的孟詩詮釋傳統？至於個別學者另行列舉「七言」以為孟浩然之佳作，此舉既有改變該特定詮釋傳統的意義；同時是否也涵有繼承其他孟詩之詮釋傳統的意義？

通過上述的提問，則已可逼出如下的論題：對於現今的「唐詩史」撰寫或研究，如欲呈現此一撰寫或研究的意義，在「方法」上，必須先就個別唐代詩人詩作典律化的歷程，建立一套參照性的知識。

孟浩然的詩自唐代之後，被重要文士接受的情況可例舉如下：宋代王安石《唐百家詩選》選錄一百零四家詩人詩作，其中孟詩高達三十三首，居第十名。^⑩蘇軾曾予孟詩以「韻高而才短」的批評。^⑪嚴羽《滄浪詩話·詩辨》以為孟詩「一味妙悟」，故能「獨出退之之上」。^⑫劉辰翁曾批點《孟浩然詩集》，以為「孟浩然詩，高處不

⑨ 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版本同註⑦，頁362。阮忠：《唐宋詩風流別史》，版本同註②，頁82。

⑩ 宋·王安石編選，黃永年、陳楓校點：《唐百家詩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卷1，頁7-14。

⑪ 蘇軾對孟詩的評語，轉載於陳師道：《後山詩話》，頁9，見何文煥編訂：《歷代詩話》（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頁185。

⑫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台北：里仁書局，1987年），頁12。

刻劃，只是乘興」。¹³到了明代高棅《唐詩品彙》以孟詩「五絕」、「五律」、「五排」、「七律」為「正宗」，至於其「五古」僅列為「名家」，「七古」、「七絕」下居「羽翼」，¹⁴由此可見對孟詩的接受視域，到了明代明顯朝「辨體」轉向。李東陽則稱讚孟詩「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足稱「大家」。¹⁵在這一段歷程中，孟詩所受到的褒貶不一。李夢陽繼李東陽成為文壇的領袖，當代學者大抵已指出李夢陽崇尚「漢魏盛唐」之詩，其中「盛唐」尤指杜甫。順此而來，有學者如陳文新先生《明代詩學的邏輯進程與主要理論問題》，就作出李夢陽對「王、孟詩風不滿」的推斷。¹⁶此一推斷固然有可觀之處；然而，反觀李夢陽參評《孟浩然詩集》，就評語的內容來看，他未必完全否定孟浩然的詩。此外，其序云：「予觀劉子評浩然詩，當矣；然有未至者焉」，則可見他參評孟詩的觀點，乃針對劉辰翁的評語而來；觀其評語內容，亦有回應明代在「辨體」的視域下，以「格調」的觀點去接受孟浩然詩的意義。同時他又以「雄」、「健」的詩歌範式，去重塑「孟浩然詩」的典律性。¹⁷當代學者雖然已對李夢陽參評孟詩的觀點，進行初探；¹⁸但是尚未全面地就李夢陽參評的觀點及所

-
- ¹³ 見元·劉辰翁〈孟浩然集跋〉，收錄於唐·孟浩然撰，劉辰翁批點，李夢陽參評：《孟浩然詩集》（明吳興凌濛初刊朱墨套印本）。
- ¹⁴ 明·高棅：《唐詩品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據上海辭書出版社藏明汪宗尼校訂本影印）。
- ¹⁵ 李東陽：《麓堂詩話》，見丁仲祐編訂：《續歷代詩話》下（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頁1641。除上文所引評語之外，李東陽又引孟浩然〈聽鄭五惜琴〉「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也」。可見他對孟氏的稱許，此一評語所本觀點，亦屬「辨體」，版本同上，頁1637。
- ¹⁶ 陳文新：《明代詩學的邏輯進程與主要理論問題》（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65。
- ¹⁷ 李夢陽批評劉辰翁之說，見李夢陽〈孟浩然集跋〉，收錄於唐·孟浩然撰，劉辰翁批點，李夢陽參評：《孟浩然詩集》，版本同註¹³。李夢陽以「格」、「調」的觀點去評說「孟浩然詩」，如評〈從張丞相獵贈裴迪〉下云：「調雜，非古非律」、評〈澗南即事貽皎上人〉下云：「田家元日至此三首是一格」等多首。又他以「雄」、「健」的詩歌範式，去評說「孟浩然詩」，如評〈尋天台山〉下云：「此首勝登樟亭樓詩，劉卻不許，不可曉。華頂、惡溪極有照應，『揚帆截海行』，更雄」，如評〈傷岷山雲表觀主〉下云：「好，淒中有健」等多首。
- ¹⁸ 當代學者如簡錦松先生、陳國球先生的論著，已涉及李夢陽參評「孟浩然詩」的論題。不過，上述二位先生的論點集中在就「古律之辨」的角度去論述李夢陽評論「孟浩然詩」「調雜」的意義。而尚未全面分析李夢陽參評孟詩的觀點，也尚未揭明李夢陽重塑「孟浩然詩」之典律性的意義。見簡

評作品之間的對應關係，進行詳述；此外，也尚未就李夢陽參評孟詩的結果在「孟浩然詩典律化」的歷程上所涵有的意義，進行深入的詮析，如此一來，對於李夢陽詩學之意義的理解，不免有憾。倘若我們欲去闡明此一論題，則除了必須建立明代格調詩學對「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以及元代劉辰翁評點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更須上溯唐宋詩學對「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以為參照知識。這是因為劉辰翁的評點，並非自外於此一「孟浩然詩」的接受史，而是繼承與變革唐宋詩學對「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而來。如此，方能全面地彰明李夢陽如何承變先前評論孟詩的傳統，以對照、詮釋他參評的意義。此一「方法論」的思維，可以類推應用於研究歷代評論「孟浩然詩」的議題上。

前行有關「孟浩然詩」的研究取向，大體集中在詩集的箋注、詩作辨偽、詩集版本、考辨孟浩然的生平、交遊、「仕隱」觀、比較王維、孟浩然詩風的同異，追溯孟詩與陶、謝等魏晉南北朝詩人之關係，或是分析單一或特定風格之孟浩然詩的題材情意類型及其表現手法。¹⁹這種研究取向，比較偏向作者或作品本身。其研究成果本可以為「唐詩史」撰寫「孟浩然詩」提供良好的基礎；但尚未能夠完整地提供撰寫「唐詩史」的學者對顯自身建構孟詩之特色的參照性知識。本文的研究取向，則偏向歷代「讀者」如何閱讀、接受孟詩，因而與前行研究取向不盡相同，其結果就是要提供「唐詩史」撰寫、建構孟詩的參照性知識。又就本文的研究主題：「孟浩然詩在『唐代詩學』上的意義」而言，雖然已有學者針對唐代詩選本中的孟詩進行考察，如曹永東先生〈《唐寫本唐人選唐詩》中的孟浩然詩〉，²⁰但這類論著尚未擴及唐代詩話、筆記、詩作等史料，並從「典律塑造歷程」的角度，詮釋這些史料如何呈現「唐代詩學」汰選、接受「孟浩然詩」的意義。因此，本研究成果當可與前行研究互補。根據上述，

錦松：《李何詩論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頁107-109。
又簡錦松：〈李夢陽詩論之「格調」新解〉，《古典文學》第十五集（台北：學生書局，2000年），頁35。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56-157。

¹⁹ 王輝斌先生已經詳列上文所述當代學界對「孟浩然詩」的研究成果，可資參考。見氏著：《孟浩然大辭典》（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孟浩然研究資料索引（1931-2005年）」。

²⁰ 曹永東：〈《唐寫本唐人選唐詩》中的孟浩然詩〉，《天津師專學報》，1988年1期。

則本文所提出的論題，具有必要性。以下，先論述「唐代詩學」所呈現的「孟浩然詩」之「範作」及「準典律基模」。然後再詮釋孟詩「準典律化」的文化因素及社會條件。

二、「唐代詩學」所呈現「孟浩然詩」的 「範作」及「準典律基模」

本文所謂「唐代詩學」已於「摘要」處加以界說。所謂的「基模」係指始基模式。此一用詞有二層意義：第一層意義，乃是指唐代文士對「孟浩然詩」所形成的認知模式；第二層意義，則指前述的認知模式，可以用來對照唐代之後的文士對「孟浩然詩」所給予之評論的特色。相對於唐代之後的文士對「孟浩然詩」的認知而言，則此一認知模式具有初始義，故稱為「基模」。這是相應本文從「歷代讀者接受」的角度去論述「孟詩典律化」的預設觀點而來。其建構的結果，固然本諸唐代詩學之客觀史料；同時也有本人主觀理解、詮釋、建構之處，故屬於主客交融之詮釋視域下的產物。

根據「唐代詩學」中的記載，孟浩然的特定詩作，在當時受到揄揚及貶抑的情況可區分如下四種：(一)能獲得當時文士普遍推賞者，如孟浩然遊「祕省」，作「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二句，不過此詩是否成篇，今已不可考。其所受到的讚譽，據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云：「舉座嗟其清絕」可知。²¹又皮日休以為北齊·蕭慤以〈秋思〉一詩中「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二句而被文士知音所稱美，孟浩然這二句詩可與之相敵。²²上述〈秋思〉一詩中的二句，北齊·顏之推就頗為稱賞，以為「蕭散」、「宛然在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也記載：「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為王右丞所知。句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者」。²³

²¹ 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見唐·孟浩然撰，劉辰翁批點，李夢陽參評：《孟浩然詩集》，版本同註¹⁵。

²² 唐·皮日休〈鄂州孟亭記〉云：「北齊美蕭慤，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見氏著：《皮子文藪》（明正德庚辰15年，1520年吳門袁表刊本），卷7。

²³ 五代·王定保撰，姜漢樞校注：《唐摭言校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卷11，「無官受黜」條。

(二)能獲得若干文士稱賞，但其普遍的程度，不若上一類明顯。如〈過景空寺故融公蘭若〉（池上青蓮宇）、〈裴司戶員司士見答〉（府僚能枉駕），均獲《河岳英靈集》、《又玄集》選錄。²⁴〈歸故園作〉〈又題歲暮歸南山〉（北闕休上書）一詩，曾獲《河岳英靈集》選錄。²⁵殷璠在總述孟浩然生平時，已對孟浩然「竟淪落明代，終於布衣」而發出「悲夫」的感慨，則他所以選錄此詩，就涵有回應孟氏「懷才不遇」的意義。到了五代，此詩才更普遍地被認作孟浩然「不遇」的代表，如王定保《唐摭言》記載了孟浩然在王維的署所對唐玄宗誦此詩一事，特舉詩中「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二句，為孟氏「無官受黜」而感慨。²⁶五代·王夢簡《詩格要律》、王玄《詩中旨格》也摘錄這二句，前者以之為「怨刺」詩類的代表作；後者對這二句詮釋為「失時也」，也以之作為「諷刺」詩之範例。²⁷

(三)雖能獲得不少文士的推賞，但也被賦予負面的批判。這類作品也如上二類一般具有「準典律化」的態勢，不過程度偏低，以其所獲致的評價存在著爭議。如〈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八月湖水平），釋皎然《詩式》引了其中「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二句，批評孟浩然此一對句，「用功殊少」，難以進入「上流」。²⁸可見他並不認同此一對句在語言構作上有可貴之處。至於這二句所呈現之情感境界的高下，釋皎然則保留了評價。殷璠《河岳英靈集》在介述孟浩然生平時，特別摘錄此二句，評述「亦為高唱」。²⁹皮日休〈郢州孟亭記〉也摘錄這二句，以為可比美南朝齊·王融〈齊

²⁴ 唐·殷璠選：《河岳英靈集》中，見《唐人選唐詩》（北京：崑崙出版社，2006年），頁83-84。
唐·韋莊：《又玄集》卷上，見《唐人選唐詩》，頁340。傅璇琮編《唐人選唐詩新編》較前述崑崙出版社所出版之《唐人選唐詩》增加《翰林學士集》、《珠英集》、《丹陽集》、《玉台後集》。然而這四本選本，並未選錄孟浩然詩。見氏著：《唐人選唐詩新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

²⁵ 唐·殷璠選：《河岳英靈集》中，見《唐人選唐詩》，版本同上註，頁84。

²⁶ 版本同註²⁵。

²⁷ 五代·王夢簡：《詩格要律》，「怨刺門」，見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頁477。五代·王玄：《詩中旨格》，見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466。

²⁸ 唐·釋皎然：《詩式》，卷2，見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版本同上註，頁252-253。

²⁹ 唐·殷璠選：《河岳英靈集》中，見《唐人選唐詩》，版本同註²⁴，頁83。

明王歌辭七首·淶水曲》中的「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³⁰王玄《詩中旨格》也摘錄了這二句，以為有「言國興明」的諷諭之意，而可為範例。³¹

(四)能為某一文士所獨賞者。如杜甫〈遣興〉五首之五：「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³²杜甫透過這二句詩緬懷孟浩然的隱居生活，其中「清江空舊魚」一句實呼應了孟浩然〈峴潭作〉（石潭傍隈隩）一詩，可以推知杜甫應對此詩有讚許之意。《河岳英靈集》獨賞〈遇上人蘭若〉（山頭禪寺挂僧衣）、〈九日懷襄陽〉（去國似如昨）、〈夜歸鹿門歌〉（山寺鳴鐘晝已昏），以及〈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又題「永嘉上浦館逢張客卿」）中「眾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二句。³³《國秀集》獨賞〈夏日宴衛明府宅遇北使〉（言避一時暑）、〈題榮二山池〉（甲第開金穴）、〈江上思歸〉（木落雁南渡）、〈過陳大水亭〉（水亭涼氣多）、〈渡浙江〉（潮落江平未有風），此詩或崔國輔所作、〈長樂宮〉（秦城舊來稱窈窕）、〈渡揚子江〉（桂楫中流望）。³⁴《又玄集》獨賞〈送張舍人往江東〉（張翰江東去），此詩或李白所作。³⁵《才調集》獨賞〈春怨〉（閨人能畫眉）、〈送杜十四之江南〉（荊吳相接水為鄉）。³⁶又釋皎然《詩式》以〈彭蠡湖中望廬山〉中「中流見匡阜，勢壓九州雄。黯黯凝黛色，崢嶸當曙空。鑪峰日初上，瀑布噴成虹」、〈登鹿門山懷古〉中「隱跡今尚存，高風邈已遠。白雲何時去，丹桂空偃蹇」作為「作用事第二格」的範例。³⁷然相較於「不用事第一格」而言，孟氏這二首作品雖亦能獲釋皎然所欣賞，但卻不算是評價最高的作品。皮日休獨賞〈夏日南亭懷辛大〉中，「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二句，以為

³⁰ 版本同註²²。

³¹ 版本同註²⁷，頁 457。

³² 唐·杜甫撰，清·楊倫箋注：《杜詩鏡詮》（台北：華正書局，1986 年），卷 5，頁 235。

³³ 唐·殷璠選：《河岳英靈集》卷中，見《唐人選唐詩》，版本同註²⁴，頁 83-84。

³⁴ 唐·芮挺章選：《國秀集》卷中，見《唐人選唐詩》，版本同註²⁴，頁 152-153。

³⁵ 唐·韋莊選：《又玄集》卷上，見《唐人選唐詩》，版本同註²⁴，頁 341。

³⁶ 唐·韋穀選：《才調集》，卷 1，見《唐人選唐詩》，版本同註²⁴，頁 420。

³⁷ 唐·釋皎然：《詩式》，卷 2，見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版本同註²⁷，頁 279。皎然在〈彭蠡湖中望廬山〉下評說：「氣也。力也。」。在〈登鹿門山懷古〉下評說：「靜也」。氣、力、靜皆屬皎然所云「辯體有一十九字」。

可比謝朓（應作何遜）〈與胡興安夜別〉中「露溼寒塘草，月映清淮流」二句。³⁸

除了上述四類之外，像釋皎然《詩式》又舉孟浩然〈九日同諸公登峴山〉（又作「盧明府九日峴山宴袁使君張郎中崔員外」），評為「有事無事情格俱下第五格」，可見貶意。³⁹這種接受的結果，不屬於本文所欲討論之「範作」、「準典律」。

綜合上述「唐代詩學」中對「孟浩然詩」特定作品、特定詩句摘選的情況，其中可歸結出如下要點：

(一)在「唐代詩學」中，比較能夠看出孟浩然詩「準典律化」的作品，如上述第一至第三類所舉作品。其中，往往以這些作品的特定文句，作為評價的焦點。因此偏向「摘句」的批評。至於第四類，僅屬於「範作」。

(二)在上述「唐代詩學」裡，所選評孟浩然詩作（含有句無篇者）二十二首中，五言佔十七，七言只佔五。而且以五律居多。可見唐時就偏取孟浩然五言之作，這一點與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所謂「五言詩天下稱其盡善」有相互呼應之處。

(三)就上述「唐代詩學」中，所提及之詩作的語言層面來看，依其「意象」與「情思」結合的型態，可概分為二：(1)「意象」與「情思」並列於作品之中，分屬不同的文句，二者之間存在著「觸發引生」的關係，而不必具有「類似」的關係。(2)「意象」與「情思」交融不二，難以句摘。又「意象」中，以實寫當前的「自然景物」居多，虛寫的景物較少。而就所抒之「情思」而言，以人事聚散所引發的悲歡之情居多，諸如「懷人」、「懷鄉」、「傷逝」、「男女相思」、「今昔之感」，次下是抒發如「園林飲宴」或「山居生活」的閒情。再次下是寫追慕「禪境」、「隱逸之思」者。再次下是「追求功名的志向」、「不遇的感慨」。純粹寫景，而「抒情自我」完全隱沒的詩作最少。另外，就用典與否而言，以局部詩句用典的情況最多，通首用典或是不用典者偏少。從這個面向上看，在「唐代詩學」中比較偏向孟浩然那類藉著寫景，略用典故而流露出人情聚散的感觸、或園林山水飲宴之趣的詩作。

³⁸ 版本同註²²。

³⁹ 唐·釋皎然：《詩式》，卷5，見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版本同註²⁷，頁338。

三、「唐代詩學」對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

本節所欲探討的論題是：「唐代詩學」詮釋、評論「孟浩然詩」所採取的特定觀點。就個別詩論家對「孟浩然詩」的詮評而言，其觀點本就未必一致；不過這些不同的觀點，在當時亦可能代表了不同唐代文人群體所操持的詩觀；又其觀點甚至還可向上提舉到與「人之存在」相關的文化傳統。所謂的「文化」即指向被當代或歷代文士所共同操持而具有歷史積澱意義的價值判斷及行為模式。本節將就上述「詩觀」及「文化傳統」去探究唐人對「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

唐人對「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之一：是來自「氣性人格」、「修養境界」的觀點。已有不少學者指出唐代的社會，普遍推崇「隱逸」的行為。並且也從這個角度去解釋「孟浩然詩」在當時受到推許的原因。⁴⁰這個觀點固然無誤，但尚未能夠完全說明唐人對「孟浩然詩」的特定接受視域。蓋唐代社會所以崇尚「隱逸」，另與「由隱求仕」或「由隱得仕」的行為有關。這類行為背後所因依的價值，其實是追求名利。因此，時人對於這類「隱士」未必皆許以「清」之美譽。從史料來看，唐人往往由「清」的價值判斷，去論定孟浩然的人格，並由此認知「孟浩然詩」的風格基調；所以如此，除了根源於「人格即風格」的文學傳統；⁴¹還應與如下的文化傳統有關。就「清」所

⁴⁰ 劉大杰云：「隱士的生活是同田園山水分不開的，這些都是盛唐田園詩歌的思想、生活的基礎……孟浩然的隱鹿門」，見氏著：《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1990年），頁444。李豐楙云：「唐人求仕的心態是現實而坦然的，求之不得，只好歸園……因此，孟浩然詩集中不少山水、田園詩乃實際經驗的產物」，見氏著：《山水詩傳統與中國詩學》，收錄於中華文化復興推行委員會編：《中國詩歌研究》（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5年），頁104。葛曉音云：「盛唐田園審美趣尚的形成與文人的隱居方式直接有關」，並舉孟浩然詩為證。見氏著：《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頁105。丁成泉以為「隱居之風」是造成盛唐山水詩藝術高峰的環境與條件，他並舉孟浩然詩所以聞名當時為證。見氏著：《中國山水詩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頁63、72-75。

⁴¹ 「人格即風格」的文學傳統，可以上溯至漢代，而確立於淮南王劉安與司馬遷詮釋〈離騷〉的作者情志，並將之典範化的行為。相關論述可見顏崑陽：〈漢代「楚辭學」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收錄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主編：《第二屆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1994年），頁232。

涵具的文化傳統而言，可有二種主要的類型：(一)信守「普遍道德」的價值，即便處在困窮的際遇，也不改其志向。此一傳統由儒者所建立。例如《孟子·離婁上》云：「伯夷，聖之清者也」、《史記·伯夷列傳》：「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嚴忌〈哀時命〉：「中皎潔而淑清」^{④2}等都呈現了此一價值傳統。(二)不慕「名利」而超曠的生命情調，並以此作為行事的價值判斷。這一類與上一類的差別在於，這種生命情調或是來自於「個人內在本具的氣性」而發用於外的神態；或是遣去一切意念造作及形軀欲求的執著之後，觀照外物而呈現的「心境」，凡此皆與上述所謂的「普遍道德」無涉。就來自「個人內在本具的氣性」而發用於外的神態而言，在魏晉人物品鑒裡，就經常流露此一價值判斷，如《世說新語·賞譽下》稱王彌「風神清令」、《世說新語·品藻》：「叔寶神清」，另如《文心雕龍·明詩》所謂「嵇志清峻」，則由嵇康才性之「清」，而言其作品所呈現的樣態。就遣去執著而流露的「心境」而言，此一傳統則可上推至道家、佛家的思想，如《莊子·天下》所謂「寂乎若清」。《華嚴大疏鈔》所謂由「覺性」而呈現的「清淨」。^{④3}在唐代，這二家思想，因為在「遣去執著」而復歸「寂」、「淨」的心靈境界上有相通之處，故往往被當時的文士作會通式的理解。^{④4}

唐人所以評價孟浩然的「人格」為「清」，主要偏向於上述第二種文化傳統。如李白〈贈孟浩然〉云：「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從此揖清芬」^{④5}、杜甫〈解悶〉十二首之五云：

④2 漢·嚴忌〈哀時命〉，見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台北：中華書局，1981年），卷14。

④3 唐·釋澄觀云：「智慧覺性，如密嚴云：如來清淨藏，亦名無垢智」，見氏著：《華嚴大疏鈔》卷10，《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④4 唐代文士對道家與禪學進行會通的理解，並成為他們創作上的思想基礎。關於這一點，當代學者如杜松柏先生《禪學與唐宋詩學》、葛兆光先生《禪宗與中國文化》、周裕鍔先生《中國禪宗與詩歌》均已提及。而唐代文士如何「轉化致用」佛道的思想，形成他們的「創作心靈」，從而落實到詩歌書寫、詩論建構與詩作品評的行為上，此一論題可見顏崑陽：〈從應感、喻志、緣情、遊觀到興會——論中國古典詩歌所開顯「人與自然」關係的歷程及其模態〉，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聯合主辦，「重探自然——人文傳統與文人的生活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08年6月25日到27日，五、「興會模態」的發生因素、變遷軌跡、性相特徵與存在意義之詮釋。

④5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台北：華正書局，1979年），卷9，頁461。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謾釣槎頭縮項鱸」⁴⁶、〈遣興〉五首之五云：「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白居易〈遊襄陽懷孟浩然〉云：「今我諷遺文，思人至其鄉。清風無人繼，日暮空襄陽。南望鹿門山，靄若有餘芳」⁴⁷。上述史料中，唐人主要從孟浩然雖然處於困窮，卻仍「優遊自得」的「隱居生活」，由此一「超脫名利」的生活樣態，進而讚許、仰慕他。杜甫更基於此一「人格」而概括孟浩然的詩風為「清詩」。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描述孟浩然云「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灌蔬藝竹以全高尚」，又稱許孟氏「浩然清發」、「製思清美」。句中所謂的「立義」，雖涵有「普遍道德」之義，不過就王士源的語脈來看，他更強調孟浩然由「超曠」之內在氣性而表之於外的「骨貌」、「風神」，以及「灌蔬藝竹」的隱逸行為。故他又說孟氏：「學不故儒」、「行不為飾，動求貞適，故似誕。游不利，期以放情，故常貧，名劣繫於選郡，聚不盈甌室，雖屢空不給，自若也」。他雖然提及韓朝宗以《詩經·大雅·烝民》的作者，去類比孟氏的記載，但他的重點在於凸顯孟氏「好樂忘名」的形象，不在於同意韓朝宗對孟氏「人格」的認知。

若就王士源所記載韓朝宗對孟浩然「人格」的認知為：「韓朝宗謂浩然間代清律，真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所謂「穆如之頌」語出《詩經·大雅·烝民》所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據毛序鄭箋之詮釋，則此句當指尹吉甫作詩以慰仲山甫之勞，其作有如清風，能夠調和人之性情。如此一來，韓朝宗乃偏由政教上「普遍道德」的價值判斷，去認知孟浩然必能如同尹吉甫，創作「清風」一般之詩。此一認知孟氏「人格」的觀點，在唐代前期恐未必普遍。殷璠《河岳英靈集》云：「余嘗謂彌衡不遇，趙壹無祿，其過在人也。及觀襄陽孟浩然罄折謙退，才名日高，天下籍台，竟淪落明代，終於布衣，悲夫！」殷璠的評論，已觸及孟浩然「士不遇」的處境。然而他對孟氏的人格所云「謙退」、「才名」，仍傾向於個人才性的觀點。到了晚唐五代，對孟氏人格的觀點，才逐漸轉向「普遍道德」的意義。如皮日休〈郢州孟亭記〉所云：「先

⁴⁶ 唐·杜甫撰，清·楊倫箋注：《杜詩鏡詮》，版本同註⁴²，卷17，頁817。

⁴⁷ 唐·白居易撰，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9，頁760。

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句中的「天爵」語出《孟子·告子上》，乃以「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為其內容。相對於「天爵」是「人爵」，其內容指「公卿大夫」之祿位。則皮日休認為孟浩然雖然際遇困頓，可是因其具有「仁義忠信」之善，故得以顯貴於世；而無待人間祿位方可為貴。從這一則評語來看，皮氏評斷孟氏人格的價值根源乃本諸儒家而來。前述五代的詩格，大多由「政教諷諭」的角度，去詮釋孟詩的作意，凡此已轉向由「普遍道德」的角度，去認知孟氏的人格及其創作。

此外，唐代的文士從「清」的角度去接受孟浩然詩，並由此區別孟詩與其他詩人詩風的差異，已逐漸開啟了「區辨孟浩然家數」的概念，例如杜甫〈遣興〉五首之五云：「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此處「凌鮑謝」一方面稱許孟浩然詩的成就超過鮑照、謝朓（或解作謝靈運）；另一方面也涵有孟浩然詩風與鮑、謝二人不同的意義。又如皮日休〈郢州孟亭記〉云：「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為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唯吾鄉之孟先生也」。這段話指出唐玄宗時，詩壇如王維、高適、岑參、李白等詩人推崇、追求「建安體」的風潮。現代學者羅宗強先生《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已有相關的論述。⁴⁸中唐韓愈〈調張籍〉就特別推崇「李白、杜甫」為代表之盛唐雄麗的詩風。⁴⁹而皮日休所言正在指出孟浩然之詩風不同於李、杜，又可與之並駕齊驅。

唐人對「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之二，乃是來自於「自然興感」的詩觀。此一詩觀的內容指向詩人「內在情意」有感於「外在景物」而自然興發的心靈經驗，以及落實在語言構作的層面，能自然而不刻意。如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云：「浩然每為詩，佇興而作，故或遲成。」所謂「佇興」就是等待靈感，不勉強而作。皮日休〈郢州孟亭記〉所云：「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所謂「遇景入詠」即指孟氏往往因當下之景

⁴⁸ 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94。

⁴⁹ 唐·韓愈撰，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集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9，頁989。其言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物的觸發，有感而作。「不拘奇抉異」即指孟氏在構思上不刻意求奇，卻能表現高妙的文思；就像春秋魯國公輸盤（或作魯班）之所以為大匠，乃在於他不刻意追求精巧。

在此一詩觀下，往往預設了特定作品的「意象」構作型態，以資體證；同時透過對這類作品意象的摘取與詮評，而逆推作者「自然興感」的心靈經驗。此一特定「意象」的構作型態，指「意象」雖然包涵「景物」與「人情感思」，但二者之間必相互交融。又此一「景物」往往為創作當下所目臨之景。而在表現上，不必拘守固定的形式安排，如前景後情，或前情後景等去呈現之。故如殷璠舉孟浩然〈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一詩中「眾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二句，評為「無論興象，兼復故實」。就此一評語的內容來看，一方面指此一詩句之「象」有兼用歷史典故之處，此一典故應指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另一方面則指此一「象」乃由詩人因當下景物而興發之人事活動及人情感思而來。故劉辰翁批點這二句云「且不犯時景」。就「眾山」、「孤嶼」而言，固然是外在客觀之物，然而詩人卻說「遙對酒」、「共題詩」，則此山、此嶼便成為可與人共飲、助人題詩的有情之物，則由此「象」之情景交融的樣態，可以逆推作者「自然興感」的心靈經驗。他又舉〈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中「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二句，評為「亦為高唱」。就此一詩句之「象」而言，集中呈現了洞庭湖壯闊的氣勢，然而從「蒸」、「撼」二字卻也不難體會詩人內在主觀的感動。殷璠所以特別摘出這些詩句之「象」，蓋認定了這類寫景的詩句，都因詩人內在情性與外物自然交感而來，符合他所標舉之「興象」。此正可與他所謂「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之說相呼應。又如芮挺章《國秀集》所選孟詩，其作品之「象」，主要有二種類型：其一、以優美的園林景色及閒適的人事活動呈現生活情趣，如〈過陳大水亭〉；其二、由眼前之景興發人事相思離別之悲，如〈江上思歸〉。由芮挺章引陸機〈文賦〉所云：「詩緣情而綺靡」，並對這句話進一步解釋為「是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風流婉麗之謂也」，可知他也認為「詩」是詩人內在之情，與外在景物，「相宣」、「交映」，交融不二的產物。是故他特別選錄上述二種類型的孟詩。這類講究「自然興感」的創作觀念，自魏晉以來就有不少論述，如陸機〈文賦〉云：「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文心雕龍·物色》：「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等，而其哲學根源

更可上溯《呂氏春秋》、《樂記》之「物感」論。⁵⁰

唐人對「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之三，乃是呼應由山水、田園的寫作以呈現「習禪悟理」之境的創作風潮。此尤以唐代王維所開展的那類「山水」、「田園」創作為代表。這類作品往往只對外物進行觀照，而如實呈現景物自化之象，至於詩人主觀的情意輒隱沒不顯，藉此體現詩人「悟道」之後的「寂境」。⁵¹這種類型的創作，雖也涵有悟道之心與外在之物湊泊交感之意，然而與上述第二種接受視域下以喜怒哀樂的情感而與外物交感的心靈狀態，並不完全相同；此外也與第一種接受視域下，偏就孟浩然的人格及其隱逸的現實行為，去認知其作品風格不完全相同。蓋在此一視域下，偏由作品本身的意境，去感知詩人的「心境」。前述提及孟浩然所作「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二句，曾獲當時文士稱譽，以為「清絕」，五代王定保更指出王維尤其

⁵⁰ 詩人因外物而興感的創作經驗，起源甚早，至於從理念上對這類經驗進行反省，大抵自漢魏晉。漢儒所表述的理念偏取此一興感的經驗，在人事政教上意義。至於此一興感的經驗，另緣外在景物而起的意義，至魏晉較為明顯。如陸機《文賦》、鍾嶸《詩品》與劉勰《文心雕龍·物色》中的論述，可為代表。魏晉所凸顯的「興感」觀念，既有針對特定詩類的作品而來的個殊義；也有泛指一般創作經驗而來的普遍義，又其與前代以「詩」、「騷」之作品而表述的「興感」的理念也未必相同。關於這一點可參呂正惠：《抒情傳統與政治現實》（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頁3-34。以及顏崑陽：〈從應感、喻志、緣情、遊觀到興會——論中國古典詩歌所開顯「人與自然」關係的歷程及其模態〉，版本同註⁴⁴。此一偏取自然景物興感的論述，歷經唐宋文士的發展，到了南宋中期，另以「情景交融」為術語而顯題，到明代謝榛《四溟詩話》、王夫之《薑齋詩話》則完成了「情景交融」的理論體系。此一歷程可見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又此一「感物」所以可能的哲學依據，可以上溯至漢代的「氣類相召」、「物感」之說，如《呂氏春秋·應同篇》所謂「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禮記·樂記》云：「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等。後世「政教關懷」與「自然美感」二種創作理念，皆可能本諸此「氣類相召」、「物感」之說而來。關於這一點可參龔鵬程：《文學批評的視野》（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頁47-84。此一哲學基礎雖未必可見於上述魏晉文士的自述，但可能內化於他們的心靈中，成為他們建構理論的思維方式。本文以為唐人從「自然興感」的視域去接受「孟浩然詩」應偏向以魏晉為始所發展起來的「興感」傳統。

⁵¹ 詩人習禪悟道之後，以「虛靜」或「空寂」的心境，去觀照萬物，從而朗現萬物自生自化之質。其中還可就詩人是否書寫自己在「境」中的活動，而區分不同類型。關於這一點，可參顏崑陽：〈從應感、喻志、緣情、遊觀到興會——論中國古典詩歌所開顯「人與自然」關係的歷程及其模態〉，版本同前註。

讚賞這二句詩。從這二句詩之「象」而言，就是如實呈現了幽靜的夜景，並未雜染詩人主觀的情意。所以王維頗推許之，蓋這類詩句體現了孟浩然「悟道」之後的「寂境」。皮日休也引了被顏之推許為「蕭散」、「宛然在目」的〈秋思〉去類比這二句詩的成就，此一詮評的結果，亦有本諸此一接受視域之處。其他唐詩選本中對孟詩選錄的結果，亦涵有這類接受視域。例如《河岳英靈集》所選〈過上人蘭若〉，通首只呈現了禪寺內外幽靜的景象。此一選錄的結果，有呼應這類接受視域之處。

唐人對「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之四，乃是講究「立意」、「精思」。如王昌齡《詩格·論文意》云「夫作文章，但多立意」、「凡屬文之人，常須作意」，⁵²釋皎然《詩式》所云「精思一搜，萬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難」、又云「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⁵³在此一觀點下，皎然舉〈彭蠡湖中望廬山〉中「中流見匡阜，勢壓九州雄。黯黯凝黛色，崢嶸當曙空。鑪峰日初上，瀑布噴成虹」為例。這段詩句將山水之景，作細膩的刻劃，以呈現雄健的氣勢，已不同於上述悟道的心境下所觀照的「幽靜之景」。清代·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就指出這段詩句「精力渾健」，因此不可以「襄陽詩都屬悟到，不關學力」的泛論去概括孟詩的總體風格。⁵⁴其所謂的「學力」正指出孟浩然這類詩作刻意經營的特質，因此符應了釋皎然「精思」、「冥搜」的要求。其他如韋莊《又玄集·序》所云：「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均涵有「精思」之意。則其對孟詩的選錄，就對應了這類接受視域。不過，孟浩然獲選的首數，在《又玄集》中所佔數量不算多，可見韋莊認為孟詩中可符合此一視域者並不多。

唐人對「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之五，乃是「比興符碼」的詩觀。凡此可見於唐五代詩格之類的著作，對孟浩然詩的詮評。晚唐五代的詩格，由「比興符碼」的觀點，去詮釋孟詩特定詩句的意義，如前述所引王夢簡、王玄。此一觀點實與盛唐以來詩格

⁵² 唐·王昌齡：《詩格》，卷上，見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版本同註⁴⁷，頁162-163。

⁵³ 版本同註⁴⁸，頁222、232。

⁵⁴ 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8，見郭紹虞：《清詩話續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85年），頁2132。

所歸納「比興六義」的意象構作類型有密切的關係。如王昌齡《詩格》十七勢所立「比興入作勢」，又由此進一步規範此「意」的內容乃「風雅比興賦頌」之「六義」。⁵⁵而這類講究「比興符碼」的詩觀，實上承漢儒對「詩騷」的箋釋而來。

上述第二節所提出孟詩的「準典律」，或是對應上述單一接受視域而來，又此一視域被諸多文士所共同操持，例如「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係對應了上述唐代由「習禪悟理」而來的接受視域。又或對應了二種以上的接受視域而來，顯示它累積了不同詩觀之文人群體的共同認可，例如〈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係累積了由「自然興感」以及「比興符碼」的詩觀而來的接受視域。

四、「孟浩然詩」在唐代準典律化的社會條件

此處的「社會條件」係指向「社會或文化關係」、「聲望資產」、「傳播推廣」等條件。「孟浩然詩」在唐代所以成為範作或是準典律，其內在的因素固然來自於詩觀或是文化傳統。但必須另就外在的社會條件，才可以解釋他的詩作如何能普被人知以及推估其準典律化的程度為何？

就「社會或文化關係」而言，係就哪些「並世的人際關係」或「異代的文化關係」，使得孟浩然的詩得以不斷地在「唐代」流傳並累積讚譽的論題，加以探討。就「並世的人際關係」而言，從學者們有關孟浩然交遊的研究中，可知孟浩然的交遊遍及「宰輔、州牧、僧道、隱逸、農夫、女流」等等。⁵⁶然而促使他的作品「準典律化」的「並世人際關係」，主要可有下列二類：(一)面交：指當面交往的朋友。此即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中所提及「丞相范陽張九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尚書侍郎河東裴朏、范陽盧僎、大理評事河東裴摠、華茫太守滎陽鄭愔之、太守河東獨孤冊」等與孟浩然結為「忘形之交」的朋友。其他如李白、袁瓘、韓朝宗、王昌齡等人均屬之。(二)耳聞之交：指聞其名而私慕之，彼此並無直接而密切的交往關係，如王士源、杜甫。至於其親族

⁵⁵ 版本同註⁵²，頁154、182。

⁵⁶ 見王輝斌：《孟浩然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二章「孟浩然的交遊」。

之人際關係，對於孟氏作品「準典律化」的作用較小。就「異代的文化關係」而言，此處「異代」泛指不與孟浩然同一生存時期之意。「文化關係」係指後人因「文化」上的「道」，與孟浩然的為人及其作品相契，因而建立起「同道」的「私淑」關係。例如白居易、皮日休、羅隱、釋貫休等。

就「聲望資產」而言，係就孟浩然本身及推許他的文士在唐代社會上所擁有的聲望、地位，去解釋「孟浩然詩」得以被認同的普及程度。就這個論題而言，一方面與孟浩然在當時的文名有關，如殷璠已指出孟浩然「才名日高」。另一方面則與推許他的文人在當時的社會上所擁有的政治社會地位及文壇的聲望有關。此尤以王維、張九齡、王士源為代表。有關王維、張九齡二人的政、社地位，可見王士源的序文。此外，韋諷在〈孟浩然詩集重序〉中提及常欲見王士源而不可得。⁵⁷由此可見，王士源「隱逸」的形象，在當時社會享有頗高的聲望。又孟浩然本身的文名以及推許他的文士在社會上所居的地位、聲望，這二者之間往往存在著互為循環關係。此即孟浩然因為這些並世的重要文士之推舉而揚名；又因為孟浩然累積了這些揄揚，因此能吸引更多同代或後代文士，尤其是政壇或文壇上具有高度聲望之文士的關注及仰慕。例如王士源對孟浩然詩予以推舉，韋諷因此將士源所編之《孟浩然詩集》「送上祕府」，以便「庶久而不泯，傳芳無窮」。王定保亦引孟浩然頗為王維所知，來推許孟浩然。

就「傳播推廣」而言，係就孟浩然的詩集或是對他的作品進行編選之詩選本在當時刊刻傳播的狀況，去解釋孟詩在當時社會可能具有的知名度。本來「傳播推廣」可來自二個面向：(一)作者有意編選、彙整自身的作品，並積極刊刻之，以便擴大自身在社會上的知名度。(二)透過旁人編選、彙整，並積極刊刻，以達到擴大知名度的效果。就孟浩然詩準典律的論題來看，顯然不是來自上述第一種型態的傳播方式，因為據王士源的記載，孟氏對自身的作品「就輒毀棄，無編錄，常自嘆為文不逮意也」。孟浩然之弟孟洗然，及王士源均曾為孟浩然的詩集加以編刊。其中附有王士源序的版本，更受當時社會的看重，前述韋諷之說，已可為證。除此之外，在唐人編撰的「詩選本」

⁵⁷ 唐·韋諷〈孟浩然詩集重序〉，見佟培基：《孟浩然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附錄」。

中，當以殷璠《河岳英靈集》及芮挺章《國秀集》在唐代刊刻傳播的程度，可能對孟詩準典律化有較大的作用。有關唐人編選的「詩選本」在唐代刊刻傳播的情況，將留待日後論述。

五、結論

總結上述可知，若干「孟浩然詩」在唐五代之時，因累積了同一或不同的接受視域下，諸多文士所賦予的正面評價，故而成為「準典律」；此外，也有不少特定「孟浩然詩」，因為符合特定詩人或詩學家的接受視域，故而被摘出成為「範作」。這類「準典律」及「範作」，是否能夠成為「典律」，則須視往後文士對於這類作品的接受結果而定。

此外，上述「孟浩然詩」準典律化的程度，另與詩人所處外在社會條件有關。此一外在社會條件包括了孟浩然所屬「並世的人際關係」或「異代的文化關係」，孟浩然及推許他的文士所擁有的「聲望資產」，以及孟浩然的詩集與對他的作品進行編選之詩選本被「刊刻傳播」的狀況。

唐五代之後，文士對「孟浩然詩」的評說，其中固然有繼承「唐五代」文士的接受視域之處，但也隨其所持特定的詩觀，而形成不同的接受視域，例如有些宋人在追求「清苦」或「清淡」的詩觀下，重塑「孟浩然詩」的準典律或範作。又如宋元之際的劉辰翁從「不刻畫」、「乘興」的詩觀去接受「孟浩然詩」，而凸出「清麗」、「清妙」的「孟浩然詩」。明代李夢陽轉從「辨體」的詩觀以及「雄健」的體式，提出特定「孟浩然詩」，以為範作。上述宋元明文士對「孟浩然詩」的接受視域，相較於「唐五代時期」，皆有承有變。此一有承有變的過程，正體現了「孟浩然詩典律」的建構歷程。本論文的結果，正可作為參照知識，用來對顯宋代至今對「孟浩然詩」的評說所涵具的承變意義。

主要參考及引用文獻

一、古代典籍

- 屈原撰，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台北：中華書局，1981 年
- 孟浩然撰，劉辰翁批點，李夢陽參評：《孟浩然詩集》，明吳興凌濛初刊朱墨套印本
- 孟浩然撰，佟培基箋注：《孟浩然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 王昌齡：《詩格》，見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年
- 李白撰，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台北：華正書局，1979 年
- 杜甫撰，楊倫箋注：《杜詩鏡詮》，台北：華正書局，1986 年
- 釋皎然：《詩式》，見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年
- 釋澄觀：《華嚴大疏鈔》，《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 殷璠選：《河岳英靈集》，見《唐人選唐詩》，北京：崑崙出版社，2006 年
- 芮挺章：《國秀集》，見《唐人選唐詩》，北京：崑崙出版社，2006 年
- 韓愈撰，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 白居易撰，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 韋縠選：《才調集》，見《唐人選唐詩》，北京：崑崙出版社，2006 年
- 韋莊：《又玄集》，見《唐人選唐詩》，北京：崑崙出版社，2006 年
- 傅璇琮編：《唐人選唐詩新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 年
- 皮日休：《皮子文藪》，明正德庚辰 15 年，1520 年吳門袁表刊本
- 王玄：《詩中旨格》，見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年
- 王夢簡：《詩格要律》，見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年
- 王定保撰，姜漢樞校注：《唐摭言校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年
- 王安石編選，黃永年、陳楓校點：《唐百家詩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年
- 陳師道：《後山詩話》，見何文煥編訂：《歷代詩話》，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 年
- 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台北：里仁書局，1987 年
- 高棅：《唐詩品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據上海辭書出版社藏明汪宗尼校訂本影印

- 李東陽：《麓堂詩話》，見丁仲祐編訂：《續歷代詩話》，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 年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見郭紹虞：《清詩話續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85 年

二、現代中西論著專書

- 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李曰剛：《中國詩歌流變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 年
呂正惠：《抒情傳統與政治現實》，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 年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1990 年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台北：學生書局，1990 年
游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主編：《中國文學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0 年
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 年
龔鵬程：《文學批評的視野》，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 年
鄭賓于：《中國文學流變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年
張建業：《中國詩歌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
丁成泉：《中國山水詩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
阮忠：《唐宋詩風流別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7 年
葛曉音：《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年
木齋：《中國古代詩歌流變》，北京：京華出版社，1998 年
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0 年
王輝斌：《孟浩然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年
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陳文新：《明代詩學的邏輯進程與主要理論問題》，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年
王輝斌：《孟浩然大辭典》，合肥：黃山書社，2008 年

三、單篇論文

- 李豐楙：〈山水詩傳統與中國詩學〉，收錄於中華文化復興推行委員會編：《中國詩歌研究》，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5 年
曹永東：〈《唐寫本唐人選唐詩》中的孟浩然詩〉，《天津師專學報》，1988 年 1 期

顏崑陽：〈漢代「楚辭學」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收錄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主編：《第二屆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1994 年

簡錦松：〈李夢陽詩論之「格調」新解〉，《古典文學》第十五集，台北：學生書局，2000 年

顏崑陽：〈從應感、喻志、緣情、遊觀到興會——論中國古典詩歌所開顯「人與自然」關係的歷程及其模態〉，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聯合主辦，「重探自然——人文傳統與文人生活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08 年 6 月 25 日到 27 日

侯雅文：〈宋代「詞選本」在「詞典律史」建構上的意義——對「詞史」的研究與書寫提出「方法學」的省思〉，《淡江中文學報》第 18 期，2008 年 6 月

四、學位論文

簡錦松：《李何詩論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 年

**The significance of Meng Haoran's poem in
Tang Dynasty's poetics in the view of “Tang
poetry canon history”: a reflection on
methodology for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book
about “Tang poetry history”**

Hou, Ya-w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brings up a series of theses on Meng Haoran's poem canon history by reflecting o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on Meng Haoran's poem in literary history and Tang poetry history. The theses focus on showing reception sights for reading Meng Haoran's poem by all the past dynasties' readers, analyzing and inducing the elements and conditions which conduce to Meng Haoran's poem canonization. The paper might provide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book about “Tang poetry history” with reference knowledge. In methodology opinion, the research is necessary.

The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first part of the series theses : The significance of Meng

Haoran's poem in Tang Dynasty's poetics. It may be a reference for showing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ung Dynasty to Ching Dynasty reader's opinions on receiving Meng Haoran's poem. In the approach, first, I explain the model and canon-to-be of Meng Haoran's poem in Tang Dynasty's poetics. Secondly I explain reception sights of Tang Dynasty's poetics on Meng Haoran's poem. Finally, I interpret the social conditions which conduce to Meng Haoran's poem canonization in Tang Dynasty with views of social-cultural relationship, popularity, communication.

Keywords: Meng Haoran, canon, reception sight, Tang Dynasty, methodology